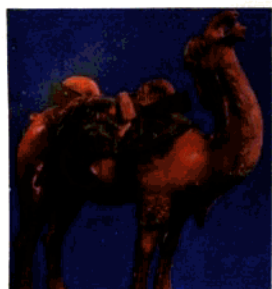


青海人民出版社

樊保良 著



# 中国古代 少数民族

与

# 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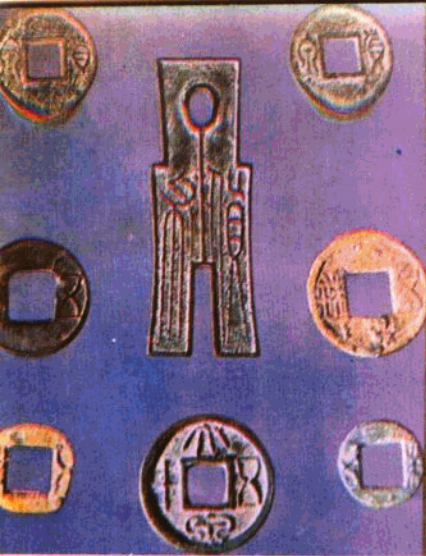
B2



陕西昭陵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和运丝骆驼俑



新疆吉木萨尔唐代北庭故城遗址出土的铜镜



新疆古丝绸道上出土的汉代货币



新疆出土的古罗马金币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帕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青花瓷盘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北壁唐代壁画中的一组乐队



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第69窟中龟兹文石刻



新疆若羌县瓦石峡古城遗址出土的珍珠、玛瑙等饰物

丝路重镇——敦煌莫高窟外景



# 序

## (一)

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发展，在亚洲与欧洲的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有关丝路情况的一些历史传说。近代以来，我国和国外所发现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文物，又把这段历史进一步提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发展。为表彰张骞及其伙伴胡人甘父通使西域的功绩，西汉政府曾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打这以后，丝绸之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繁荣。为此，人们怀念张骞与甘父的历史功绩，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丝绸之路得到繁荣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秦汉以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强大的国力；也是由于我国和西方各文明古国经济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我国的长安、洛阳等古都，终点在欧洲的希腊、罗马。中间在国外曾经过印度、波斯、阿拉伯等文明

古国；在国内也经过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起点和终点，以及沿线的许多重要城镇，都各有其辐射区。因此，对丝绸之路不宜理解为只是一条或几条主要干道，加上各个辐射区的通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所联系的地区是非常广阔的。

由我国通往国外的丝绸之路有好几条：有森林道（在草原道以北的森林带）；草原道；西北农业区道（由长安、洛阳等古都经河西四郡、塔里木盆地的各绿洲的通道）；还有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又有一段通过今青海省进入新疆的羌中道。在上述几条道路之中，在海运大开之前，最重要的为西北农业区道，其次是草原道。西北农业区道之所以最为重要，因为这条道路是最安全的，同时在这条道路沿线有许多重要城镇，商旅可以沿途进行贸易并随时可以补充旅途所需的物品。至今在这条道路沿线，仍然存在许多著名的石窟寺、古城遗址等，成为历史的见证，这是其他各条丝绸之路不能相比的。

## （二）

丝绸之路是古代我国与欧亚诸国，特别是与欧亚诸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由我国传到西方的文化主要有：丝绸、金属器皿与冶金技术、凿井技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中医（脉理、针灸等）、中药（黄连、大黄、肉桂、菖术、姜、无患子等。黄连为青霉素发明以前最重要的消炎药物）、梨（印度古称至那弥——唐言汉持来）、桃（印度古称至那逻阁弗咀逻——唐言汉王子之意）、排箫等乐器。还必须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我国的哲学思想等

也传到了西方国家。

从古代新疆或通过新疆，我国内地也接受了大宛马、葡萄、胡豆（蚕豆）、胡桃（核桃）、胡蒜（大蒜）、胡荽（芫荽）、胡瓜（黄瓜）、胡琴（多种弦拨乐器）、胡床（马紮子）、胡食（唐代称饌饌——今维吾尔族的抓饭、胡饼——烤饼等为胡食）、石榴（安石榴）、菠菜（波斯菜）、棉花（先前内地人对棉花很不理解，曾称之为“垆种羊”，误认为是种在地里的羊所长出的羊毛），另外，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伊斯兰教等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了我国。伊斯兰教的传入虽有海路与陆路两道，但主要是由陆路传入的。现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主要聚居于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力证。

古代长安、洛阳等古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不仅向西到达希腊、罗马等国，而且还向东与高丽、日本等国相联系。

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各族人民与西方各国的各族人民都身受其惠，高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各族人民也身受其惠。对于促进有关各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丰富各国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丝绸之路上，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十分丰富，丝绸只是其中的一种。以丝绸作为各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名称，并为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普遍乐意接受，这是有深刻原因的。我国是丝绸的祖国，以绚丽多彩、深受人们喜爱的丝绸作为有关各国各族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 (三)

从我国东部海岸到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在我国境内的长度，有好几千里，远比长江、黄河为长。在古代我国丝绸的产地，不仅限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和城镇，而且还包括着吴越、巴蜀、楚湘等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丝绸产地。在南北朝以后，养蚕缫丝、纺织丝绸的技术已经传到了天山以南的各个绿洲，从这以后新疆所产的丝绸，也参加了国际与国内的贸易。

丝绸之路在我国境内的部分，对于促进和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影响更为深远。在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这个问题的内涵非常丰富，在这里显然不能细说。

从长安、洛阳西去的丝绸之路上，甘肃境内的河西四郡（如加上金城郡则为河西五郡），新疆境内的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于阗（今和田），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其中敦煌的地位尤为重要，我国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把它与近代史上的上海市相比拟。《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中说，有些东来的商人，在敦煌进行交易后就折返了，有些则继续东行。我国古代的民谚说，胡人经商，走一路，停一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如果用赛跑来打比方，它不像马拉松，由起点由同一帮人一口气跑到终点，却有点像接力赛，由不同的若干帮人几经接棒跑到终点。但它与接力赛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只有极少数人经辗转传递由起点到达终点，多数在中途就停止前进了，他们停止在了各自的目的地。西去的进程

是这样，东来的进程也是这样。其所以如此，有种种复杂的原因，除了各国商人的目的地各有不同外，丝路上的强国争夺分享贸易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人物，有外国和我国各民族的商人；外国使节（包括以使节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各种宗教的宗教学者和传教士；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家；杂技艺人，以及落户在长安、洛阳和其他贸易重镇上各种移民等。这些人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传播，都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 （四）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就拿丝绸之路这门学科来说，同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国的学者们发表了许多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难怪有些学者把它称之为当今的显学。同时，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相适应，我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有关丝绸之路的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大量重印并出了注释本。如在季羨林教授的主持下，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最完备的注释本和语体文翻译本。我国少数民族学者所写的一些古籍，如维吾尔族古代学者的名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等都翻译成了现代维吾尔文和汉文出版。还应该看到，中国丝绸学会及其分会成立后，曾经召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前些天，兰州大学历史系的副研究员樊保良同志将所著的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的书稿，交给我看，并嘱我写篇序文。我与樊保良同志相识多年，并曾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共事。我在五年前就知道他开始写这本专著。我在阅读了书稿之后，深感他为完成这本专著曾付出长时间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深感这本专著有一个新的贡献，就是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对发展丝绸之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这本专著不仅在历史研究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也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正确阐明我们祖国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优越性，是我国历史学界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谷 苞

1994年4月于兰州

## 前 言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西北各游牧民族，他们出于自然的或人为的某些原因，不避寒暑，纵马挥鞭，历尽艰辛，一批又一批的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这条草原道路的开通，远较张骞“凿空”为早；这条道路的开通，对于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促进中西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灿烂的中华文化最早走向世界，精美的丝绸最早运往西方，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欧内陆草原地带，既是古代游牧民族劳动生息的地方，又是他们从事商品交换的广阔市场，还是他们迁徙争夺的活动舞台。我国北方的北狄、匈奴，西北的塞人、月氏、乌孙等族，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有的举族西迁，有的往来留驻，逐步迁入中亚、西亚地区，甚至从蒙古高原经中亚北部，沿里海、高加索、黑海北岸，进入欧洲平原。于是中国的物质文明伴随着他们的马鞍和骆驼，逐渐传到了西方。在这些贩运者、传播者的强大队伍中，尤应重视塞人、匈奴和月氏等族。

塞人是一支东起蒙古草原，西至亚欧大陆，分布甚广，来去悠忽的古代游牧民族强大集团，在中国文献中称他们为“塞种”或“塞人”，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人”，波斯称其为“塞卡人”。他们操东伊朗语，长期受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

由于他们广布中亚、西亚及中国西北等地，所以与当地各族，特别是月氏、乌孙及《汉书·西域传》中说的伊循、姑师、渠勒、莎车等有渊源关系。

关于塞人西迁，近年来国内学者认为：“传说中周穆王曾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王母代表西方极远处，和觚竹、北户、日下并为四荒（《尔雅·释名》）。西王母是塞人部落，‘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 Skyth）民族的首音，《汉书·地理志》中的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宁西）西北塞外，祁连山南麓，似可看作塞人祖居的地方，后来越迁越远。塞人西迁开始极早，周穆王西巡大致是追随塞人西移的路线”（参见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5—16页）。“居住在我国河西地区的塞人，也因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不得不沿天山南北麓西行，西迁楚河、伊犁河，乃至更西地区。由于民族大迁徙，由于塞人及其他游牧民族在亚欧地区的交往，早期的东西方陆路、丝绸之路前身——被外国学者称之为‘草原之路’或‘毛皮之路’已经进一步开拓。这是一条东起黄河流域，经蒙古草原，过阿尔泰山，沿天山北麓，通向中亚和南俄罗斯的商路，是一条东西方贸易之路”（参见彭树智撰《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载《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1期）。成书于战国时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巡及会见西王母的历史传说。《竹书纪年》和《史记》也分别采录。“这些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近年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证实其间的许多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参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中的李学勤

《序》)。《穆天子传》还记载周穆王西巡时，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赠送大批马、牛、羊、麩酒，西域的美玉也大量运到了中原。

月氏和乌孙原居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汉代以前，月氏势强，攻杀乌孙王，王子昆莫被匈奴收养，长大成人。汉初，匈奴冒顿单于联合乌孙进攻月氏，月氏败后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了久居于此的塞人而占有其地。塞人被迫南下，在公元前177至176年，迁至帕米尔地区，后又东迁至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区。后来，匈奴老上单于又与乌孙王联合进攻伊犁河流域的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为王庭”（《汉书·西域传》）。当塞人、月氏相继大部南迁以后，乌孙便弃“敦煌·祁连间”故地，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与遗留下来的塞人及月氏杂居相处，并渐次广布于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直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乌孙国。其政治、经济中心设于伊塞克湖附近。乌孙在中亚北部地区居住时间很长，且与汉王朝交往甚密。

塞人的历史交往，既有战争的一面，又有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一面，各种交往形式交互进行。例如在公元前8世纪，世居中亚北部的一支塞人，在另一支塞人压力下，逐渐迁移到黑海西北部。后来与希腊人在黑海殖民城邦建立了通商贸易关系，经济交往又带来了文化交流。此外，分布于咸海以东和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一带的塞人，与天山以北的塞人不仅在人种和语言上十分相近，而且经济生活也相似，养马业很盛，擅长骑术。天山北麓通往中亚及南俄的道路，由于各游牧民族的中介

作用而畅通无阻。这里在古代是极其辽阔且无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诸部落用商品交换的交往方式，在中国——希腊这一远距离空间，充当了最早的丝绸商贩角色。

月氏、乌孙、匈奴、塞人的相互撞击，接踵西迁，他们在东西方经济、文化文流，草原古道的拓宽，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联系加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为丝路的开拓者。再如与“河西道”平行的南面一条重要通道——“青海道”（羌中道），也是羌族早在战国时期首先开发的。可以说，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和相互交往，导演出了张骞“凿空”的丰功伟绩以及“丝绸之路”的明载史册。

关于中国的养蚕织丝，从目前已经释读的甲骨文字中，得知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样，而且还有祭祀蚕神的记载。法国人L·布尔努瓦的研究指出：“当人们异口同声地肯定中国离开了竹子就无法生养休息的话，那完全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丝绸的情况亦然。汉语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珍品的重要性：在汉语最通用的五千个方块字中，就有二百三十多个带有‘纟’的偏旁，其中也包括‘纸’字”（参见〔法〕L·布尔努瓦著·耿升译《丝绸之路》第10页）。在商代我国的养蚕和缫丝，已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已有较大发展，五彩缤纷的织锦、多种多样的锦绣，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或华贵服饰。它在游牧民族中已成为重要的等价交换物，起着货币的作用，而且主要是通过游牧民族之手，贩往亚欧草原各地。例如春秋后期，出没于边塞的义渠、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以及战国时崛起于北方的匈奴，都与西邻的月氏、塞人等游牧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有着密切的交往。

地下发掘也充分证明，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西方人已

使用丝绸。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发现墓中人体的骨骼上，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参见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229页）。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国丝绸出土，从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看，属于公元前3世纪之物（参见戴禾、张英莉著《中国丝绸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载《西北史地》1986年1期）。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耳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发现的贵族石顶巨墓中，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绸物，系用捻股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铺盖在衣服上的。这批墓葬的时间，大致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最突出的是，巴泽雷克3号墓曾出土有花纹的斜纹绮，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的鞍褥面，是一块施有刺绣的平纹绸，刺绣图案是色调优美的凤凰、孔雀缠枝纹。同期墓葬中出土的还有西亚出产的羊毛绒毯和精细的羊毛织物。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秦式镜。巴泽雷克5号墓中发掘出当地独一无二的一辆四轮马车，从马车的形制和随葬的丝织物推测，都来自中国，推测墓主是曾和中国和亲的阿尔泰部落首领，而墓葬主人的骨骼都属塞人，并经涂敷香料。阿尔泰诸部落首领是一种混有蒙古利亚成分的欧罗巴人种，他们和中亚细亚的塞人部落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外，在新疆的阿拉沟（今托克逊西）东口，1977年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出土的菱纹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运到天山山麓。阿拉沟东口竖穴墓的主人正是塞人（参见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1—22页）。

综上所述，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我国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



族的马队及骆驼队，已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丝路。并且，各游牧民族因其自身的畜牧业经济特点和经营方式，充当了早期丝路贸易的主角。

继匈奴之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一度完全控制丝绸之路或占有丝绸之路，成为经营西域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主宰者。“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其后，鲜卑拓跋部异军突起，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太武帝拓跋焘致力经营西域，不仅使长达100余年的北方分裂割据局面宣告结束，也使丝绸之路自汉武以来出现又一度繁荣。北魏的都城洛阳，成为当时既是“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魏书·食货志》）的丝路贸易中心，又是“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洛阳伽蓝记》卷五）的佛教活动中心。

突厥族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周书·异域传》）的大汗国，完全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方。其后，突厥又分裂为东西两汗国，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时期，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伊犁河上游），后移汗庭于石国（中亚塔什干）北之千泉，其冬天牙帐设在今阿富汗北境之巴尔赫附近。突厥强盛时期，中原王朝为了笼络他们，每年都要送去大量的丝绸。北周“岁给缯絮锦綵十万股”，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周书·异域传》）。隋炀帝一次在榆林行宫（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会见突厥启民可